

利益边疆：国家主权的发展性内涵

[作者] 杨成

[单位] 南京政治学院

[摘要] 全球化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全方位的冲击。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国家和人类社会对于自身利益的认识是建立在地理概念基础之上的。只有当人类大范围频繁交往逐渐形成一种制度和潮流时，当人类的利益不仅仅在自己所属范围内存在时，利益边疆才会产生。在全球化时代，维护领土边疆是生存意义上的主权利益，而维护国家的利益边疆则是发展意义上的国家主权利益。我们需要认清这一历史性的重大变化，以确立一种具有发展性内涵的国家主权观。

[关键词] 利益边疆，国家主权，世界视野，发展性内涵

全球化进程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根本性的变革。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在物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等方面发生了整体性的变迁。全球化催生了利益边疆，从而国家主权基本内涵也相应地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利益边疆已经成为全球化时代维护国家主权和制定国家战略的重要基点。

全球化与利益边疆的凸显

全球化的实质是全球的经济行为开始跨越政治上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国家和地区的边界，把整个世界更紧密地从经济结构的深层次上连接起来。从而进一步在政治制度、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产生全球性影响的过程。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对现代主权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作用、对国家主权的适用范围等方面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和影响。

传统上，国家的组成有四大要素：领土、人口、政府和主权。随着全球化的深化和拓展，组成国家的基本要素内部开始发生变化。这包括人口的跨界流动、政府职能的转化和领土概念的拓展，以及主权观念的深化。其中，建立在传统领土概念上的主权观念面临新挑战。

在国际法中，国家主权是国家的最基本的属性，也是国家自然权利。由此便引申出国家其他四方面的基本权利：一、独立权；二、平等权；三、自保权；四、对内最高管辖权。这四大权利实际上分为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独立权和平等权是国家主权的国际存在并发挥相应作用的必要前提，是国家主权在国际关系中的最基本的体现；自保权是国家主权在国际关系中的安全保证；对内最高管辖权是国家主权的国内体现。这几方面权利缺一不可地支撑着国家主权的完整存在。〔 〕根据国际法，国家所享有的必需的最为重要的权利是国家基本权利，由于国家享有这些权利才被承认为国家。“哲学上的理论是，国家参加国际社会是基于它们的基本权利得到承认和接受。国家主权的观念的发展增强了这种理论。”〔 〕

国家主权内外两方面权利实际上处于两个层面：一是规范层面，如国家应该享有对内最高管辖权和对外独立、平等和自卫权等，具有质的规定性。二是操作层面，即对内最高管辖权的实现程度和对外主权的拥有程度，具有实际可操作性。国家主权的对内最高管辖权具体体现在政府合法性的普遍承认和政府的统治职能和社会职能的顺利实现。而国家的外部主权表现在自卫的权利和自卫的能力，也就是国防和安全力量。国家主权内涵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了对规范层面（质的规定性）认识的深化和对操作层面（可操作性）方式的创新。

利益边疆的出现与全球化的飞速发展息息相关。全球化从四个方面为利益边疆提供了基础条件。首先，新技术革命导致了地域空间的压缩化。马克思曾经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

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事实上,自工业革命以来新技术革命一直是推动人类社会飞速发展的原动力。历史进入 20 世纪中后期,随着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普及,人类社会就更加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国际地域空间压缩化的突出表现就是随着交通工具和通讯手段的变革,人类物质和信息交流的时间和环节明显减少。美国可以从全球范围内调集战略部队,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其战略部署,也恰恰说明了在现代新技术面前,地域空间的不断压缩。[]地域空间压缩化为利益边疆的出现提供了基本的地理基础。而地域空间压缩化的确切含义实际上可以理解为:全球范围内地域空间的压缩化与单元国家非地域空间的拓展化并存。

其次是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国际利益的交融化。全球化是人类进入“世界历史”[]以来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新的形式和过程。它包含两个层面: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在自然经济社会,各国政治经济活动一般相对封闭。经济全球化则冲破了国界、摆脱了疆域束缚。当代国际资本的高度流动性、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展,使得国际间共同利益的相互扩展和延伸。在一国疆域内,必然也会有他国利益的客观存在,国际利益呈现出交融化的趋势。全球相互依赖的增强推动了国际间追求“绝对利益”共识的强化。[]这一点在经济和文化等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国际利益的交融进而也推动了国际制度的建构,为利益边疆提供了正向推动的利益基础。

第三,全球公共问题促进了人类利益的公共化。全球公共问题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日益凸显。目前的全球公共问题主要包括:恐怖主义、环境污染(卫生安全)、跨国犯罪和贩毒,大规模杀伤武器扩散,人口和难民问题,等等。[]全球公共问题具有的全球性、客观性和危害性的特征使得传统的疆域安全概念受到冲击。例如,恐怖主义在世界的蔓延推动了国家安全利益的变化和转型,传统独守家门式的安全观念只能应付传统领域的安全问题,而且传统的疆域观对于新的国家安全利益的维护往往是被动和不利的,非传统安全合作问题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SARS 疫情的跨国性传播就是典型的新型、非传统安全问题。基于此,全球公共问题使得人类安全利益的拓展和公共化,必然作为反向力量建构利益边疆出现的利益基础。

最后,全球化促使人类社会结构和交往方式网络化。传统社会结构主要限制于国家疆域内,主要包括人口结构、家庭结构、组织结构、社会分层、就业结构、城乡结构和区域结构等七个方面。[]随着全球化和全球交往方式的变迁,社会结构具有了更多的跨国意义。全球公民社会的兴起和跨国利益集团的涌现非常清晰地表明了这一趋势:即人类社会结构正在由传统的“平行线”型结构向“网络”型结构转换。信息时代支配性功能与过程日益以网络组织起来,网络建构了我们社会的新社会形态——网络社会(the network society)。正如网络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所期待的,“历史才刚要开始,此时我们的物种所达致的知识与社会组织水平已容许我们生活在一个根本上是社会性的世界(Social world)之中。”[11]当然,对于当代国际体系而言,网络社会还只是一种进化和发展趋势。在全球社会形态不平衡发展的现实状态中,网络社会的“市场占有率”更多的与区域一体化的程度成正比。但这种趋势对于利益边疆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它为利益边疆的存在提供了基本的跨疆域社会结构基础。

总体上,地理空间的压缩,交往工具的进步和交往方式的变革,以及全球间相互利益的交融,使传统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发生了动摇。在全球化条件下,国家的领土边疆已经不能完全涵盖国家主权的全部内容,国家主权需要“利益边疆”新概念来支撑。

利益边疆的基本内涵和特性

国家利益边疆是一个多层次、宽领域的客观要素体系,是一个综合性的范畴。在静态上

分析，它既包括各主权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军事、安全等各种实体性要素，也包括国家的民族心理、民族意识、国民士气等精神性要素。在动态上分析，它则表现为各主权国家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和层次上，空间范围的拓展及其对相应利益的概括，也就是国家利益的地缘层次。总之，利益边疆主要是指，在历史过程中产生并在全球化时代凸显出来的，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判定主权国家之间或与其他行为主体之间利益划分的界限和范围。要更好的理解利益边疆的基本内涵，首先需要界定和厘清三组基本概念的关系：

一是利益边疆与领土边疆。传统意义上的领土边疆就是国际法公认的主权国家行使对内最高管辖权的地域界限。利益边疆则没有非常明确的地域指向性，它的表现形态之一是地域的界限和范围，因此在很多时候利益边疆和领土边疆所包含的是同一个内容。但同时它又表现出某种非地域性特征，例如信息边疆就具有无形性特点，它远远大于领土边疆。所以说，利益边疆是领土边疆概念的放大和转化。

二是利益边疆与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是主权国家制定国家生存和发展战略的根本依据。基本上国家利益具有客观性和主观性并存的特点。[12]，国家利益与利益边疆是对同一内容从不同角度进行的概括。利益边疆回答的是国家利益的范围。所以，利益边疆就是国家利益边疆。在肯定国家利益的基石性作用的同时，国家利益与利益边疆有两个方面的区别：两者的侧重点不同，利益边疆侧重强调国家利益在现实世界的区分和划分，具有某种地域指向性；两者的时代性也不同，国家利益与主权国家相伴而生，而利益边疆则是全球化时代发展的特有产物，强调利益的渗透性和辐射性。

三是利益边疆与国际利益。利益边疆与国际利益的主体基础不同。利益边疆从个体国家角度分析其利益的地域指向，具有单元性的特点。而国际利益更多的是从国际社会群体角度考虑利益的存在状态，强调单元国家之间利益的共性，具有结构性的特点。同时，两者又具有一定的契合性。两者都涉及到了领土边疆之外的国家利益问题，都强调一种外向型的发展取向。对于单元国家来说，利益边疆既包括国内利益，也涵盖了该国的国际利益。在一定意义上，利益边疆是对国家利益和领土边疆两种形态的有机融合。目前的利益边疆尚未也不可能完全摆脱领土边疆，因而具有某种过渡性的特征：即主体疆域的地域性、明确性与边缘疆域的融合性、模糊性并存的特点。

国家的利益边疆横向可分为安全利益边疆、经济利益边疆和价值利益边疆三个部分。从纵向又可分为核心利益边疆、重要利益边疆、一般利益边疆和边缘利益边疆四个层次。[13] 主权国家的主要任务依次就是坚决捍卫国家的核心利益边疆，积极维护重要利益边疆和一般利益边疆，不断拓展边缘利益边疆。

利益边疆的主体内容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国家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边疆。巩固和完善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并逐步扩大自己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是主权国家生存的基础之一。全球化在政治上的联带是深远的，一个国家施行的政治制度在全球化过程中要受到很大的压力。意识形态领域的利益和意识形态边疆的问题在全球化中并没有被完全淡化，事实上其在国际社会交往过程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韬光养晦”也不等于不要国家的意识形态利益。[14]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实行何种社会制度，已经涉及到国家的核心利益。维护国家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边疆是国家主权的重要体现。

国家的经济边疆。经济边疆是全球化时代突出来的重要形态，它既包括国家经济利益的拓展取向，也存在某种意义上收缩取向。因为伴随着国家之间经贸交流的增加，国家的经济利益必然要突破基本的国家地理界限，向外发展，本国在国外的投资、本国的国外能源供给线都属于国家的经济边疆，而本国领土疆域内的某些经济领域也必然会伴随着他国经济利益的融入。比如海关关税，出于共同的利益预期，一国的部分利益只能与他国分享，这就是国家的另一种非稳态的经济边疆。跨国公司的争夺是经济边疆最典型的代表。它打破了国家边

境，使一个国家在某一经济领域里不可能获得全部经营利润。

国家的文化边疆和信息边疆。全球化内含的文化全球化必然带来一个文化主权和文化边疆的问题。文化边疆就是指民族国家的文化习惯、信仰和价值观念在国家疆域内外的客观存在。文化主权就是维护文化边疆并保持其延续性和发展性的权利和权威。由于民族文化具有的基础性、长期性和根本性的作用。随着全球化交流的深入，文化的功能和对于文化边疆的维护已经越来越引起各国的普遍关注。国家的信息边疆主要是指在遥感技术、卫星通信、网络技术和多媒体技术等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的条件下，主权国家维护自身信息资源、获取和创造新信息的能力空间和领域。[15]它为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联系渠道提供保证。由于信息边疆具有无形性和普遍性的特点，客观上使传统的地理疆域概念基本失效。在国家疆域内部，公民可以比较自由地获取疆域外的所需信息；而在国家外部，可以通过各种通讯技术获取该国情报。目前的信息差距和知识分配严重地贫富分化，将会严重影响国家主权的维护。

最后，国家的安全边疆。国家的安全边疆是以上种种边疆的安全形态和形式，是对所有利益边疆的维护，也是思考国家利益边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安全边疆不同于边疆安全。全球化时代，一种客观的发展趋势是国家追求的安全边疆普遍大于国家的领土边疆。除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安全概念外，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国家安全边疆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国家人力边疆的安全。人力边疆就是指国家培养的人才在全球分布中的所有权与使用权问题。[16]它表明了国家培养和保留人才的能力与效果。全球化时代国家间竞争的重点之一，就是人才领域的争夺。人力边疆现在的趋势就是技术人才合法地迁往资本的核心国家，而外围国家由于竞争优势的缺失和政策法规的不完善，在维护国家人力边疆中处于劣势地位。例如，1990年美国工程学博士学位中的62%授予了外国人，主要是亚洲出生的学生。美国的研究生教育又为定居美国提供了方便途径，结果70%以上的哲学博士留在美国并最终成为美国公民。[17]目前，人力边疆的失控已经成为冲击南方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因素。

作为一种复合性概念，利益边疆具有多重特性。一方面，利益边疆具有核心的明确性。国家的根本利益是利益边疆作为地域性利益观念存在的基本前提。主权国家作为独立个体存在必然会存在生存与发展的内生诉求。国家利益作为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逻辑延伸，自然成为国家追求的基本目标。利益边疆在全球化时代依然是为了主权国家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即与利益内核的天然相通。

另一方面，利益边疆具有边缘的模糊性、交叉性。利益边疆产生的基础决定了它是一个交互性的客观存在。利益边疆是一国国家利益向外辐射的范围，而随着全球性交往的深入，各国利益边疆在向外拓展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一个交融的趋势。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已经成为利益边疆的基本特征之一。

同时，利益边疆还具有存在的客观性和适用的普遍性。只要是在全球化条件下，只要存在正常的对外交流，就存在利益边疆问题。人们也许会认为利益边疆只适用于大国和强国，适用于对外扩张性的国家。这其实是一种误解。事实上对于中小国家，一样存在如何维护和拓展国家的利益边疆的问题。比如新加坡会非常关注泰国金融业的稳定，而海湾的石油价格一样会影响到瑞士的国内市场。[18]利益边疆还是一种价值观念的转变，即从地理向利益、从生存向发展的转变。主权国家发展成长的历程和全球化的本质就是不断突破传统疆域，寻找个体或整体利益的最大化。

当然，对利益边疆的不同追求会给世界带来不同的后果，有时甚至会对霸权的追逐。现代国际体系产生以来（广义全球化范畴），经历的国际秩序体系主要包括：霸权体系、均势体系和制度体系。[19]这三种体系产生了相应的追逐利益的基本模式。第一种模式是霸权式。霸权模式作为国际体系形态已经成为历史，现存世界秩序只能说带有某种霸权色彩。历史上的西班牙、荷兰、英国以及德国和日本，都曾经无限制地追求国家利益的向外拓展，但最终都相继失败。即便是今天奉行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战略的美国，也面临某种溃败的危险。

[20]第二种模式是纷争式。近代欧洲形成的均势格局和冷战时期美苏形成的两极均势,都是以利益边疆的互相敌对和限制为基础的,奉行的是“零和(zero—sum)”思维。这时虽然没有一个能独霸世界的单极霸权,但均势纷争带来的后果往往会变成均势霸权。第三种模式就是理性式。它存在的体系基础是制度体系逐步显现并占据重要地位。这种体系目前还是一种发展趋势,在这种模式下国家能够比较理性地处理本国与外国利益的交融和冲突,并通过公认的国际制度安排来实现合作和解决分歧。当今国际秩序更多的是一种混合形态,既存在退化到霸权模式的危险倾向,也面临均势模式的现实挑战,还具有进化为制度模式的发展希望。所以说,问题的关键不是利益边疆本身,而是主权国家面对利益边疆所采取的基本态度。

利益边疆与中国国家安全

“在全球化的现时代,虽然国家利益在形式上仍由国家(政府)决定,其内涵早已不再纯粹是一个国家的决定;国家利益的定义和范围,大大超出传统的认知框架。”[21]利益边疆的出现使得国家主权从其存在的传统领土边疆中拓展出来。国家主权规范性层面加入了新的内涵。即国家的对内最高管辖权和对外独立平等自卫权的辐射范围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而也需要我们在操作层面寻找新的突破。

首先,确立具有世界视野的国家安全观。由于国际格局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原因,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没有形成正常的国际参与模式。中国的安全更多意义上强调“井水不犯河水”,是维护国家生存权的安全观。伴随者中国融入国际社会进程的加快,客观上“井水”与“河水”经常流在一起且很难区分,即利益边疆已经客观地摆在了中国的面前。

追求利益边疆的首要前提是实现理念的认同,即是否认同利益边疆的客观存在。这有是认清全球化时代国家主权所面临挑战的前提和理念基础;然后才是确定国家的战略选择取向,即如何认可和维护国家的利益边疆。这是国家确定不同安全观和发展战略的重要决定因素。如果说纯地理疆界可以用条约来确定,但经济渗透力所达到的隐性疆界是无法用条文来约束的。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影响力不由自主地向外扩张,在中国周围已经形成了向外辐射的锯齿状影响区,这种影响区虽不是其实际疆界,但其穿透力已经很明显。加入WTO后,中国的实际利益开始遍布全球,从陆地大国走向海洋大国大势所趋。

从中国安全和发展视角分析,目前我们还处于理念认同和战略选择之间的过渡期。一方面,即随着融入全球体系进程的深化,我们已经逐渐认识到了中国的国际利益问题。[22]如建立亚太地区相关的区域经济体系和安全机制问题,保证中国国家能源稳定的国内储备和国际供应问题,以及维护联合国在国际社会中的权威地位问题等等。但是,由于中华文化的历史传统和长期以来的政策导向,目前这种认识还是初步的、非系统性的利益边疆观。事实上,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可避免地融入国际体系,不断地影响着世界和被世界影响着。中国走向世界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中国近期的外交实践表明了中国外交战略中正在出现的全球视野。[23]

其次,谋求与国际社会的正向双向认同。在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看来,社会结构是“观念分配”或称为“知识储存”(stock of knowledge)。有些观念是共有的,有些是私有的。共有观念构成了社会结构的“次结构”,即“文化”。在国际社会中包含的文化有,霍布斯文化——敌人的文化;洛克文化——竞争的文化;康德文化——朋友的文化。[24]当代国际关系已经从最初霍布斯文化下的无序冲突逐渐演变为洛克文化下的有序竞争,并在某些区域(欧盟)某种程度上建构了康德文化。事实上,共有观念或文化对于推动国际社会的稳定发展具有基础性的作用。谋求与国际社会的正向双向认同,就是积极构建具有中国因素的国际认同文化。

中国的“世界观”从“中国之世界”向“世界之中国”转化的过程,表明了参与国际社

会的重要意义，在中国领导人和普通公民心中已经达成基本共识。[25]但是，世界对于中国崛起的态度总还存在种种怀疑。抛开敌对势力遏制中国发展的企图，我们在树立一个和平、开放和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方面，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努力。当今世界的基本潮流是：经济全球化、世界政治多极化和政治生活现代化（法治化和民主化）。[26]这种潮流建立在国际社会普遍价值标准认可的基础之上。因此，谋求与国际社会的正向双向认同，必须顺应历史潮流，从内部建设和外部战略两个方面入手。时代发展对现代政府职能提出的客观要求以及国际社会的主流认同标准，都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改革国内经济体制，为发展先进生产力提供体制环境。需要国内经济体制的优化转型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渐进式完成。更为重要的是，加速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不仅是中国深化改革，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必要环节，而且是改善中国对外形象的基础。

第三，改造和创设国际制度，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边疆。国际制度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瓶颈之一就是国际制度的“改制”和“建制”问题。[27]而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无外乎“后发制人”和“另起炉灶”两种。目前的全球国际机制主要有国际政治与安全机制和国际经济与金融机制，前者包括联合国的安理会决策机制、裁军机制与维和机制等；后者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及世贸组织等。在现行的国际机制中，有的随着世界形势的发展已不适应当前的需要，有的则本身就存在着某些不平等与不合理性。“后发制人”加入现有国际制度虽不失为一种建设性选择，但付出的代价往往是“后发制于人”。

所以，结合目前国际环境，“另起炉灶”可能更易于推动国际制度建设的合理性和公正性。我们应该树立以中国为核心筹建国际组织的意识，这其实就是一种发展形态的国家利益边疆。近些年来，中国对建立某些国际组织表现出积极的兴趣。特别是2001年6月由中俄和中亚四国组成的上海合作组织。这是一个集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为一体的综合性区域国际组织。而正在酝酿中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将有可能使中国取代日本成为带动东亚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从而巩固它在该地区经济核心的地位。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国际组织虽然只是区域性的，却对中国具有特殊而深远的意义，是中国拓展区域影响和利益边疆的具体步骤。众所周知，中国长期恪守“不结盟”政策。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奉行“不结盟”政策的国家成为世界强国。美苏的强国之路都伴随着北约、华约和经互会等强有力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组织。法、英、德三国深知，要想在未来世界强国俱乐部中占有一席之地，唯有走联合之路，这正是欧盟加速向邦联型国家实体迈进的深层含义。近期，中国在朝鲜问题中的关键作用表明，随着与国际社会日趋密切的联系，中国已经越来越意识到国际机制决策的重要性。[28]

强调利益边疆并不等于否认国家主权的绝对性特质，国家主权依然是现代国际体系建立的基础和基石。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更应该重视在主权安全领域发生的巨大变化，以便找到相应对策，更好的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利益边疆的凸显是全球化和科技发展的客观产物。它对于中国这种处于特殊区位的发展中大国来说，具有极其特殊的意义。我们对于国家的安全的认识应该从单纯的地理概念认识中脱离出来，用无形的利益边疆去代替有形的国家疆界。国家安全的根本目的就在于捍卫国家的根本利益。国家的利益就是国家的无形领土。离开利益谈安全是“无的放矢”。围绕地理谈安全，是生存意义上的国家安全观念。围绕利益谈安全，则是着眼于发展意义上的国家安全观念。而后者，恰恰是全球化时代给国家安全带来的新内涵。

参考文献

[] 王铁崖主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81年版，第93~94页。

[] [英]沃克编辑：《牛津法律大词典》，北京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所译，光明出版社1988

年版，第 365 页。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77 页。

[] 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I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London: Blackwell—Basil, 1989, pp. 2—8.

[] Michael J. Glennon, "Why the Security Council Failed,"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03.

[]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86 页。

[] Joseph M. Grieco, "Anarchy and the Limits of Cooperation: A Realist Critique of the Newest 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in David A. Baldwin eds.,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 Jagdish Bhagwati, "Borders Beyond Control",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03

[] 俞晓秋等：“非传统安全论析”，《现代国际关系》2003 年第 5 期，第 44 页。

[] 陆学艺等著：《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年版，绪论。

[11] Manuel Castells, *The Rise of Network Society*, London: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2000, p578.

[12] 邢悦：“国家利益的客观性与主观性”，《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 年第 5 期，第 29 页。

[13] 如美国 21 世纪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其报告中就将美国的国家利益分为：生存利益 (survival interests)、关键利益 (critical interests) 和重要利益 (significant interests)。See, The United States Commission on National Security/21 Century, "Seeking A National Security: A Concert for Preserving Strategy and Promoting Freedom," April. 15, 2000

[14] 曲星：“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战略”，《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 年第 5 期，第 13 页。

[15] 赵旭东：“新技术革命对国家主权的影响”，《欧洲》1997 年第 6 期，第 25 页。

[16] 人力在经济学里经常和人力资本联系在一起，指作为生产组成要素的人的价值和能力。人力边疆其实就是人力资源边疆，是对作为国家资源的人才的抽象概括。国家的人力资源，也就是对国家公民所具有才能和价值的一种总体表达。参见赵玉林等主编：《经济学辞典》，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574—575 页。

[17] Jagdish Bhagwati, "Borders Beyond Control",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03.

[18] C. Lindblom, *The Market Syste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58.

[19] 这里包括体系层面的客观约束和单元层面国家的政策取向，其中制度体系可能还处于发展和建立阶段。可参见杨成：“国际秩序的三大选择与国际制度理论”，《社会科学》2002 年第 5 期，第 30 页。

[20] Charles Kupchan, "After Pax American: Benign Power,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the Sources of Stable Multipola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fall, 1998.

[21] 王逸舟：“国家利益再思考”，《中国社会科学》2002 年第 2 期。

[22] 参见胡鞍钢主编：《中国大战略》，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87—105 页。

[23] 阮宗泽：“从圣彼得堡到埃维昂：中国全球视野”，《瞭望新闻周刊》2003 年第 22 期，第 6 页。

[24]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9 , P . 250 .

[25] 邓小平在谈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时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明确表明了中国是世界一部分的思想。见于《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8页。另参见汤光鸿等著：《当代中国国际战略思想研究》，中国书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30页。

[26] 时殷弘：“格局·潮流·时代特征”，《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7期，第8页。

[27] 苏长和：《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06页。

[28] Evan S .Medeiros &M .Taylor Fravel ,“ Chi na' s New Di pl omacy ,” Foreign Affai rs , November/December , 2003 .

<http://www.pssw.net/essays.asp?id=290>